

批评性展览：文博机构在AI时代的美育路径

■张祺(中国美术学院)

一直以来,展览都是文博机构履行其社会美育功能的重要手段。凭借其专业性与权威性,文博机构通过展览向公众传递着经过严谨筛选与考证的“美”的知识,长期塑造着公众审美标准。然而,随着公众获取信息渠道的迅速扩张与门槛的日渐消弭,传统文博展览那种“铺陈式”的模式,因其缺乏锐度与张力,已逐渐难以触动大众受数字浪潮冲击而阈值提高的神经,致使文博机构的美育功能如今面临着趋于衰减的困境。这种困境不会自行消解,反而将在未来发展中愈发严峻。因此,文博展览的转型势在必行,亟须在呈现馆藏的常设展览以外,建立一种更彰显展览本身价值的形态——批评性展览。

时代的要求：为何批评性

所谓批评性展览,指的是一种具有批评精神的展览形态。它强调批评性,但并非意指展览间互相挑错、否定乃至攻讦,而是要求展览呈现具体、独立且系统的判断。追溯词源,“批评性”一词虽从17世纪起便和“评论”组合出现(criticism),指向“批评行为或论述优缺点”。但若回归其希腊文的原初状态“κρίτικ”,其含义实为“判断的能力”。据此,“批评性”实应为“展现出判断能力的特质”,而批评性展览,即为具备该特质的展览。具体而言,是具有一定审美、知识基础与判断能力的个人或群体,依据一定标准,对所涉议题形成清晰的认识、态度与立场,并将这种独立的判断具化为展览面貌的实践。它将批评性置于核心地位,这并非理论研究的强行赋予,而是时代对于文博展览的要求。

从外部环境审视,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催促文博展览确立其批评性。一方面,技术发展对文博展览提出生存挑战。随着近年来人工智能的迭代跃迁,海量知识的检索整合已能通过算法迅速完成,文博机构传统的“信息中介”的价值正被稀释。倘若文博展览仍持续停留于简单的罗列,将来其存在价值都将受到质疑。面对这一危机,关键就在于批评性的建立——超越单纯的信息传递,转而提供人类思考与经验之下的洞察与阐述,以人独特的视角与情感捍卫展览的不可替代性。另一方面,技术发展下公众思维的异化对文博展览提出需求。人工智能因其极度的便捷性与数据层面的“可靠性”受到大众依赖,而随着依赖加重以及信息茧房加持,人类独立思考和甄别能力面临前所未有的退化风险。对此,社会期望身负教育职能的文博机构能够通过展览引导观众主动参与思考,从而在迅猛的技术洪流之中,为社会批判精神筑造防堤。

就核心职能而言,大众美育需求驱使文博展览向批评性转型。从20世纪末哈拉尔德·塞曼的《当态度成为形式》开始,全球展览已逐渐向主动发声的文化行为演变。虽然文博展览因其受藏品限制的特殊性而受到宽容,但近年来

公众也渐渐不满于此。在技术加速时代,这种不满足进一步扩张。生成式人工智能批量炮制出的“完美”图像,正迅速冲击着人们的审美认知——短期内或许能满足表层的视觉愉悦,但这种虚假而空洞的产物终究无法满足对真实审美体验的渴求。基于此,大众期盼文博展览这一承载真实的物理空间,能够以其批评性打破虚假与冷漠,成为与历史对话,与情感共鸣的场所,以其不可替代的真实与真诚回应审美空虛。

从社会影响维度考量,社会期望文博展览能凭借其影响力推动批评传统的建立。批评在中国,长期处于尴尬的境地。考究语义,“批评”之“批”的古代本义即为用手打人,《左传·庄公十二年》中载“遇仇牧于门,批而杀之”,便印证其暴力渊源。可见“批评”一词在中国的话语体系里天然带有攻击与敌意色彩。由于此种语言理解,批评实践的环境长期充斥着顾虑与风险,于是难以充分展开。但困境需要破除,而破除需要先驱,作为社会教育的权威,文博机构自然被赋予了先行角色的期待。假使文博机构能率先在展览领域开展批评性实践,凭借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与公信力,社会对于批评实践的误解或可以被逐步消解,其健康的生存空间可被逐步建立,批评传统也有望逐步形成。

思考无处不在：如何批评性

明确批评性展览的内涵与价值,仅仅是确立其必要性共识的第一步。要使其从单纯的愿景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方法,则必须深入探讨其内在的构成。遵循展览设计的基本逻辑,批评性展览应当具备三重特质:强烈的问题意识、非惰性的叙述逻辑以及刺激观众情感与思考的展览体验。

(一)强烈的问题意识

敏锐而强烈的问题意识,是展览批评性呈现的根本。当一场展览选择关注特定的问题进行探讨时,这就完成了一次价值判断输出——它对当下社会进行甄别与评估,筛选契合价值理念的议题,并将其置于公众视野以被看见与讨论。问题意识是批评性展览建立的前提,但并非所有问题都具备批评性之品格。真正具有批评性的问题,必须兼具锐度与深度。在类型上,应当至少归属以下三个范畴:

其一,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具体问题。作为社会精神家园的塑造者,文博展览不应仅是璀璨文明的唱诗班,更应成为时代的“听诊器”。它必须对当代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弊病保持敏锐的观察,并敢于从时代症候切入,刺破表面太平,将潜藏的危机、矛盾与困境展露在观众眼前。以天目里美术馆的《鸟先于和平》为例,该展览建立了一个充满张力的批评场域:将矛头指向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揭露高歌猛进的文明背后人类以外之“物”遭受的异化与剥削。它迫使观众在具体的物理空间中直面进步话语遮蔽下的伦理问题,促使观众在

认知震撼中进行思辨。

其二,曾被忽视或遮蔽的历史观察视角。历史绝非一个清晰的故事,而是一个由无数个体与事物共同组成的纷繁世界。在主流展览中,聚光灯往往汇聚于历史的“胜利者”,而庶民、女性、少数族裔等边缘人群及其物件则长期隐匿。作为具备专业文物保存与历史知识挖掘能力的文博机构,有责任充当“打捞者”,将这些被压抑、被忽视的历史片段重新展露于世人面前。如《日用与新造:民艺里的生活美学》《桃花得气美人中——明清江南女子的艺术与生活》等展览,将观众的视线从庙堂之高拉回平常生活,让被忽视的人、物浮出水面。这种视角的转换不仅能够补全历史缺失的角落,更将历史选择性书写的权力机制更多地暴露在观众面前,迫使人们对既定的历史结论产生更深刻的疑问与思考。

其三,知识体系中被自然化的偏见与预设。在现代知识体系中,许多被奉为圭臬的知识,并非天然的真理,而是社会权力、文化与意识形态等众多要素构建的产物。只是经过长期的沉淀与再诠释逐渐剥离了诞生时的具体语境,被自然化为无需质疑的公理。但其中依然存在诸多矛盾乃至偏见,所以批评性展览需对这种被自然化的偏见与预设展开剖析。举例而言,如中国美术学院等高校所策划的工艺展览。其对“工艺”这一学科概念持续展开探究,通过对“艺术”与“实用”“工艺”与“美术”等概念的辨析探索,展现出既成知识背后的争议性与流动性,动摇观众看似确定无疑的常识。以此为核心,展览能促使观众在知识争议中觉醒,意识到知识与真理之间,亦存在一种复杂关系——这种意识的觉醒,对于打破思维惯性,培养批判性思维大有裨益。

(二)非惰性的叙述逻辑

非惰性的叙述逻辑,是展览呈现其批评性的核心路径。展览本质上也是一种文本,若将问题意识视作文本的主旨,那么叙述逻辑就是将其具象化的框架与修辞。当下展览常用的叙述逻辑以时间序列为主,以此展示展品间线性的更迭与演变。其虽能清晰地将零散的展品整理成可供阅读的历史,但由于这一编年史式手法的相对单调以及其大量的使用,观众已然对其产生审美疲劳与思维钝化——人们习惯于沿着时间轴走马观花,却鲜少思考。因此,批评性展览需要更加活跃的、非惰性的叙述逻辑。这种逻辑以思想架构为核心,为问题的叙述服务。它可以主题的形式展开,如《古希腊的旅程》在时间线之上将文明拆解为“晞”“昼”两大板块,以三个时期特征和七个专题的形式来呈现古希腊的立体面貌。它也可以是学术写作式的层层推导,如《江口沉银——明末失落的宝藏》,采用由点入面的论证策略,从宝藏传说逐步推导至明末历史,以考古研究为针脚,严密串联起传说、文物与历史知识。它的形式或

许多元多样,但其核心目的不变——邀请观众随展览进入一场思想的推理。它的活跃程度,直接关乎展览对观众思维的触动深度。它唯有打破一般时间序列的惯性枷锁,转向多元与辩证,展览才能从静止的展示走向流动的对话,真正引起观众思绪的波动,点燃其思想的火把。

(三)刺激情感的展览体验

引导观众思考,是批评性展览的最终目的。而引导思考的展览体验,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关键手段,也是展览作为一个实体空间的优势所在。当下,文博机构的展览体验在知识传递层面已日趋完善,先进的交互设备与展陈设计使得信息的输出变得简单高效。然而思考的动力不仅在于对知识的接纳与消化,更源于情感的震撼与共鸣。尤其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唯有情感能唤醒过载的感官,冲击疲惫的大脑。因此,批评性展览不能止步于对知识传播手法的优化,更应当致力于构建调动观众情感的场域,让油然而生的情绪成为驱动思考的燃料。

要构建这一场域,首先便要营造展览的空间氛围。批评性展览的空间应随主题展现出一定调性。通过光影的排布、色彩的暗示、声音的笼罩和动线的设计,空间本身即可成为优秀的修辞。以战争或死亡主题为例,逼仄的通道、昏暗的光线与有意味的色彩,能将观众带入展览主题之中,这种刻意营造的生理感受,正是促使观众入场域思考的起点。

空间的营造使观众浸润于展览之中,而肢体的交互则将这份抽象的感受转化为具体的记忆。交互,并非技术的炫技,而是与观众身心的深度互动。它可以仅是一段让静止展品“活”过来的影像,如《物观想象:器与时代的想象力》中的可爱影片;也可以是一部老旧的电话,如龙游县博物馆馆藏听筒里传来的乡音。形式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它是否构成记忆的锚点,使得展览的效力能够穿越时间,持续发生作用。

仅凭感官的沉浸不足以支撑思考的深度,此时,具有说明性与引导性的展览文本便成为观众从感性转向审视的路标。好的批评性展览文本,绝不应满足于解释“是什么”,而是致力于建立对话、发起质疑甚至留下悬念。正如《江口沉银》中“沉银之下,是一个王朝的落幕”,《对话庞贝》中“为生命思考的人知道死亡保存着什么”,这种带有诗性的慨叹,在观众心中激起回响,促使观众的视线从展品本身,移动至背后广阔的时代。

敏锐的诘问、活跃的叙述以及触动心灵的体验,赋予批评性展览超越展览本身的价值。它不仅是展览美育的殿堂,更是社会共同思考的广场。它的真正完成,不在于展览的闭幕,而在于那些深埋观众心中的思考种子——它们促使人们在回归日常以后,依然能对现实与时代保有敏锐的批判。这在人工智能时代,将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